

# 鄧小平、劉少奇與毛澤東： 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本質

李英明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 摘要

本文主要分成三部份。其一說明後毛時代「鄧小平思想」在中共意識型態結構位置的演變；其二說明鄧小平思想路線與劉少奇思想路線的關聯性；其三說明鄧小平思想路線與文章和毛澤東思想路線的關聯性。透過這三個部份的說明，呈現後毛時代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本質。

關鍵詞：道德精英主義、民粹主義、平均主義、制度主義、階級鬥爭。

## 壹、鄧小平思想的形構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訴求，配合當時後文革時代人們普遍要求從文革時代的意識型態專斷中解脫出來的心理，發起真理標準的討論運動，擊垮了華國鋒的意識型態主導權。

接著鄧小平順著黨內外要求平反的形勢，於七九年揭開重新評價中共黨史，並據以提出進行平反判準的序幕，其結果就是八一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鄧小平確立了黨內歷史註解領導權的地位。而鄧小平在握有意識型態和歷史註解主導權後，才開始努力要以自己的思想取代毛思想成為主導中共政經社會發展的實踐指導。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中，毛澤東思想被說成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通過集體化的強調，毛澤東思想被抽象化；而就在這種基礎上，毛澤東思想與現實路線政策切斷了直接關係，被供上象徵性、儀式性的「更高」位階上。如此一

來，中共意識型態結構中的實踐部份就留出了空檔，而為鄧小平思想進入中共意識型態結構提供了條件。

但問題是，究竟要以什麼樣內容的鄧小平思想取代毛澤東思想？針對這個問題，中共於一九八三年出版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這個文選的出版一方面是對文革時代和華國鋒時代舊的意識型態內容的解構，而另一方面也算是「鄧小平思想」的初構。這個文選所強調的重點凸顯必須以實事求是作為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準則。其實，這個文選主要是針對文革的意識型態專斷作風，對毛澤東個人崇拜以及對華國鋒企圖以毛澤東權威來樹立自己權威現象，強調必須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去破除。

中共從十二大以後，積極展開後毛澤東時代中共意識型態的重建工程，而其具體表現就是使鄧小平思想成為中共路線政策的指導綱領，或者使中共政策路線成為鄧小平的化身。一九八三年鄧選的出版，算是這種意識型態重建工程的第一個具體步驟。亦即，迄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只是取消了華國鋒的意識型態主導權，而至八一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和中共處理重新定位毛思想在中共意識型態結構位置的問題；但是真正的意識型態重建工程從十二大才開始。

一九八七年二月，中共出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收集鄧小平從十二大以至一九八七年一月的重要講話文章，這算是鄧小平思想的主體部份，而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共在十三大確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並企圖以之作為中共意識型態實踐性部份主體內容。此外，在十三大，中共也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作為銜接中共意識型態核心部份和實踐部份的中介。總之，在十三大中共正式宣告意識型態實踐部份轉換，以及作為核心和實踐性部份銜接工程的完成；不過，此時，中共尚未直接宣示要以「鄧小平思想」這個範疇來指涉其意識型態的實踐部份。

在八九年六四事件衝擊後，中共加緊意識型態建設的工作。當年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在鄧小平宣布辭去中共軍委主席的同時，中共正式揭櫫了「鄧小平思想」這個概念。這個全會的公報指出，鄧小平根據馬列主義同中國大陸實際情形結合的原則所提出的一系列觀點和理論，特別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是毛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是毛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和改革實踐的總結和理論根據。

全會對鄧小平的思想的界定，主要有四個重點：

- (一)仍然沿用中共過去界定毛澤東思想的方式，將鄧小平思想視為馬列主義這標的「普遍原則」和中共在中國大陸的基本建設經驗和結合；
- (二)鄧小平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繼承和發展；
- (三)鄧小平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
- (四)鄧小平思想是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總體實踐經驗的總結。

這四個重點表示以下幾種意義：(一)前兩點是從馬列主義和毛思想替鄧小平思想建構正當性；(二)後兩點把鄧小平思想視為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和人民經驗的總結，從集體實踐的角度，賦予鄧小平思想的正當性；抽離鄧個人的人格化色彩，使其具有Karl Mannheim所謂的「整體性的」(total)意識型態位格，成為後毛時代改革開放精神的化身和象徵；從這個意義觀之，中共就不止將鄧小平思想置於中共意識型態的實踐性部份，而是還企圖將其置於核心部份。就在上述的基礎上，中共九二年的十四大正式按上述的構想確立鄧小平思想在中共意識型態結構位置，不只讓鄧小平思想進入中共意識型態的實踐性部份，而且還進入純粹部份。而與上述意識型態建構相關連的是八九年三月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收集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六五年鄧小平的重要講話，特別彰顯鄧在文革前的思想是與毛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精神相一致，以及標示鄧在文革前的思想是中共八大的精神代表或象徵。

## 貳、鄧小平與文革

鄧小平在後毛時代的思想和實踐的主要立基點是揚棄文革、除文革弊端。不過，鄧小平對後文革的態度是有雙重性的，一方面強調文革造成無政府狀態的動亂，另一方面又強調文革造成意識型態專斷和對毛澤東的崇拜。<sup>1</sup>鄧小平在強調前者時，主要是指文革衝擊中共的黨政秩序，破壞了黨內生活倫理和章法，甚至導致中共政治領導權威的喪失；而對於後者，鄧小平主要是從整個社會面向來談的。鄧小平認為解決前面問題就必須回到制度主義的方向來，重建黨的權威；而對於後面問題，鄧小平強調必須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加以解決。<sup>2</sup>鄧小平在談黨的權威的重建時，主要是想到以民主集中制為基點的列寧主義式的先鋒隊政黨運作的方向上來，而這種

<sup>1</sup> Lowell Dittmer, *China under Refor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29.

<sup>2</sup> *Ibid.*, pp. 29–30.

重建是不能按實用主義的原則來進行的；實用主義只能適用於黨外的社會生活中。鄧小平站在黨內黨外有別的基礎上，區隔了黨內和黨外生活的原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十一屆六中全會，尤其是十二大之後，鄧對文革的態度有了相當微妙的變化，較少提個人崇拜和意識型態專斷的問題，而特別突出文革所造成的動亂。

這種態度的變化，與中共的政治形勢變化是連接一起的。十二大中共開展整黨，黨的重建工程揭開序幕，鄧小平在此種情況制約下，著重的是黨的制度和權威的重建，而不希望實用主義漫延到黨內運作中來。鄧小平在經過取得黨內意識型態歷史解釋以及政治權力支配的主導權後，非常在意的是來自黨外的社會大眾或知識份子的抗議和挑戰，鄧小平通過不斷強調文革動亂，直接宣示絕對不允許對中共領導權威的挑戰，從強調文革動亂為防止壓制來自黨外的挑戰尋求合法性的辯護基礎。

在突顯文革動亂的同時，鄧小平也強調對階級鬥爭的揚棄。文革動亂中的派系或團體衝突，以及毛澤東對異己的整肅，都在階級鬥爭的強調下獲得意識型態的辯護。不過，鄧小平並未完全拋棄階級鬥爭，而是有選擇性的保留運用階級鬥爭，尤其是在對付政治異己時，階級敵人的訴求就會重新湧現。<sup>3</sup>在揚棄階級鬥爭的同時，鄧小平也揚棄群衆運動，但鄧小平與中共對於群衆運動也時有選擇性的加以保留運用，尤其是當中共和鄧小平認為已經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對付會挑戰中共意識型態權威的社會潮流時，群衆運動的方式就會重新躍上檯面，這些社會潮流諸如資產階級自由化等。<sup>4</sup>鄧小平很巧妙的以避免文革悲劇作為鎮壓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權威的辯護基礎。

在八〇年以前，鄧小平在幾個重要議題上凸顯其與華國鋒觀點的不同，爭取黨內和社會的支持，創造有利和潛在的政治支持。這些議題主要有以下幾個：(一)關於領袖思想和行為的角色認知和定位；(二)中共領導權威和方式如何重建和定位；(三)知識份子和制度化教育的角色定位；(四)對於階級鬥爭如何重新看待。<sup>5</sup>

在第一個問題上，首先主要是對毛澤東思想屬性的定位，其次是對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批評。鄧小平是從毛的著作出發，強調毛在文革前的思想是實事求是，而實事求是才是毛思想的本質核心，以此和華國鋒所標榜的兩個凡是針鋒相對；就鄧而言，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文革時代意識型態

<sup>3</sup> *Ibid.*, p. 28.

<sup>4</sup> *Ibid.*

<sup>5</sup> *Ibid.*, pp. 25–28.

專斷和個人崇拜的延續和化身，因此可說是在延續文革的悲劇。鄧小平很小心的避免以赫魯雪夫對待史達林的方式去對待毛澤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鄧小平主導下，中共積極展開重新對中共歷史和毛澤東評價定位的工作，鄧小平將毛澤東在文革和大躍進的作為和大躍進之前區隔開來，避免讓文革拖垮毛的歷史地位，並且通過強調毛在大躍進作為和思想的正確性，替改革開放與大躍進之前的八大路線銜接，取得來自毛澤東的歷史辯護。

在第二個問題上，鄧小平主要強調要避免文革時代因為個人崇拜所形成的權力過度集中的現象，並且必須建立集體領導和集體決策的制度，這種訴求替鄧小平贏得廣大的政治支持。而與此強調避免個人崇拜的同時，鄧小平從十一屆四中全會以降通過恢復文革時被整肅的幹部和黨員的名譽，使鄧的政治支持更形穩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八〇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恢復劉少奇的名譽，而劉少奇的有關論黨員修養的著作，也成為鄧小平和中共從十二大展開整黨，消除文革極左勢力的重要理論依據。

在第三個問題上，鄧小平在七八年的全國科技大會的講話，將知識份子列為勞動階級，使知識份子擺脫所謂臭老九的定位；而在對正規教育的重新定位上，主要是強調揚棄文革時代的民粹主義教育路線，要讓教育回到制度主義和精英主義的路線方向上來；而且，正規教育的資歷被認為成為工作升遷和政治甄拔的要件。<sup>6</sup>與重新定位知識份子和正規教育相關的是對科技的定位，鄧小平強調科技在中國大陸發展生產力追求現代化的重要性，而且，鄧小平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才會替中國大陸上層建築的變革創造宏觀的有利條件。就鄧小平而言，回到強調生產力發展面向，才算是使中國大陸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來；在強調科技對於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同時，鄧小平也表示必須在經濟發展領域允許實用主義的心態以及工具理性的發展，因此鄧小平也會有所謂的不管是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論點。

在經濟領域中，鄧小平反對用民族主義式的群衆運動方式去操作經濟，他承認經濟領域的運作是不依群衆運動和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的，必須順著經濟的客觀規律才能讓經濟的運作恢復常態；從這個觀點出發，就形成了替經濟解套的觀念，這就影響了鄧小平的經濟和政治有別的看法，經濟不能成為政治的附屬領域，經濟的政治化反而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sup>6</sup> *Ibid.*, p. 27.

至於第四個問題，鄧小平主要也是反對用民粹主義式的群衆運動方式去操作政治，在他看來，以群衆運動方式操作政治，只會破壞黨國機器的權威，進而導致政治失序和動亂。鄧小平希望政治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有制度的運作。易言之，鄧小平所期望的政治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制度主義的政治；但就如前述，鄧小平是用相當策略性和工具性的態度去對待階級鬥爭；從避免文革動亂悲劇的向度觀之，鄧小平期待制度化政治運作的建構；但從應付挑戰中共黨國權威的力量，尤其是所謂自由化力量，鄧小平就會選擇性的訴諸階級鬥爭的手段。

鄧小平相當在意政治和經濟的區隔，而從這種區隔而來的是對於黨內和黨外的區隔。鄧小平允許經濟相對於政治的、以及黨外相對於黨內的自主性；鄧小平既不希望把經濟看成是政治的附屬，也不希望把黨外看成是黨內的附屬；但是，鄧小平也不希望黨外領域的運作方式擴張至政治領域上來。基本上，鄧小平希望政治和黨能作為價值理性化身，而經濟和黨外能作為工具理性的化身，亦即實用主義只適用在經濟和黨外領域，絕對不允許滲透到政治和黨內，或以實用主義處理政治和黨國機器的運作。如此一來，黨國機器的領導人甚至是黨員幹部，就必須被要求嚴格區隔上述雙重理性適用的領域，絕不能有所混淆和誤用。這也就是說，黨國機器的成員要作為價值理性也要作為工具理性的體現者，他們必須很清楚地在不同領域扮演不同的角色。要求黨員扮演雙重角色，嚴格分別黨內黨外生活，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政治觀點。而從這種向度出發，鄧小平所期望的是列寧式的精英主義政策；不過，鄧小平又希望黨國機器能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黨外的領域。

總的來說，鄧小平希望黨機器之外的其他領域能夠「去政治化」，按實用主義原則操作，但不允許黨外力量用實用主義來對待黨國機器；而如果黨內的價值理性原則和面對黨外的工具理性原則相抵觸時，黨就必須堅持從價值理性的原則去化解這種矛盾。因此，儘管鄧小平注意黨內外操作原則的區隔；但是，作為黨內生活的價值理性原則還是具有相對於工具理性的結構性優勢地位。

從上述這種政治內外的區隔而來的是，鄧小平允許個人、企業和各種條塊單位在黨國機器生活之外，可以不必再作為政治掛帥下的政治實體，個人可以擁有相對於政治而具有自主性的經濟生活領域，企業也可以作為相對於政治而具有自主性的經濟實體，甚至各種條塊單位都可以成為自我負責的責任實體，而責任實體的外顯價值必須通過市場機制的建立才能清

楚的表現出來；鄧小平不允許責任實體的外顯價值通過政治自由機制來加以體現。

就鄧小平而言，對政治內外和黨內外作出區隔，允許政治之外和黨外領域實用主義原則操作，這代表著政治之外領域相對於政治的解放、黨外相對於黨內的解放以及經濟相對於政治的解放；而再從個人和企業作為責任實體來看，這又代表著個人和企業相對於政治的解放。如果再把這種內外有別的原則再擴大的話，就是允許大陸之外的領域以實用主義的原則操作，後毛澤東時代的「開放」其意義主要在此。總的來說，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基本上就是按上述內外有別的原則來操作的，準此觀之，改革開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改革是對內的，而開放是對外的這樣二元劃分的關係。

### 參、鄧小平與劉少奇與毛澤東

其實，鄧小平這種內外有別的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是劉少奇路線的進一步發展。劉少奇從道德精英主義的向度，企圖發展列寧的先鋒隊政黨理論。在他看來，政治精英無論在邏輯上或實踐上，相對於一般群衆都應該是有道德的優位性；亦即政治精英應該是利他主義的人格化身，通過將個人和個別集團的利益提高到與對整體的黨的利益的追求相配合，將個別和普遍利益統一。黨的先鋒隊角色，隨黨的道德優位性來加以保持，而黨員作為道德人格化身，才能使黨的道德優位性得以實現。黨通過其道德優位性才具有引導時代發展方向的能力，這也就是說黨才能從理論高度上總結過去經驗，提出引導未來社會發展方向的觀點，從而將人們對於私利的追求從屬於對未來總體利益的追求之下。<sup>7</sup>

而既然黨應該作為集體德性的化身，則黨也因此可以成為真理宣稱的唯一根源和判準，但是劉少奇並不認為應該把黨內的道德標準強加在黨外的社會生活；黨內生活應以價值理性作為其從理論到實踐的總體基礎，但對於黨外生活不能作此要求，應該允許以工具理性作為運作基礎；不過，絕對不允許工具理性反客為主成為黨內生活的依據判準。劉少奇相當清楚的區隔了黨內外的差別，而從這個差別出發，劉少奇形成了真理二元論的觀點。劉少奇從這種角度出發強調，黨若要進行政治徵召，應該按道德標

<sup>7</sup> *Ibid.*, pp. 15–16.

準來進行，要求黨員幹部不只必須是利他主義的實踐者，而且必須擁有力將人民的私利提高到與集體利益相配合高度上來，黨員幹部如此，領導人更應該如此。<sup>8</sup>

從道德精英主義出發，劉少奇認為，政治並非衆人之事，政治運作必須以黨的德性表現作為基礎，政治必須經過黨的運作才成為可能；亦即，政治是具有道德優位性的黨的專利。黨的作為的主體其實就是政治的作為，而政治運作因此也就必須按價值理性原則來進行，以便體現黨的德性。不過，劉少奇從黨內外有別的前提，基本上也區隔了政治內外的差別，尤其是相當強調政治和經濟的不同；經濟必須按照自己客觀規律運作，而政治之外的其他領域原則上應該也可以允許各自的客觀原則運作，此外，政治之外的其他社會次級系統，也可以按照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原則運作，如此一來，就是指可以讓政治之外的領域擁有相對於政治的自主性，若硬要將政治運作法則套到政治之外的領域，甚至將這些領域政治化，這是違反文明進步趨勢的封建主義式的作法。準此以觀，我們也才能瞭解劉少奇在收拾大躍進殘局時，為何會允許三自一包，工資等級差距的根本原因。<sup>9</sup>

鄧小平基本上承繼了劉少奇路線這種內外有別的原則；因此，鄧小平在談黨的建設和經濟建設時，很清楚的從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加以區隔。鄧小平的黑白貓實用主義論，只是針對黨外（政治之外）經濟領域而言，我們絕不能將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觀點作過度的解釋。而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比劉少奇往前跨了一步，很嚴格的區隔經濟和上層建築領域的不同，經濟領域可以按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原則操作，但上層建築的諸多領域必須按價值理性原則來操作；再從這種區隔出發，鄧小平更一步要求個人要區隔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按工具理性，而精神生活按價值理性操作。其實不管是劉少奇或鄧小平的內外有別觀點，都只是體用二元論的另一種形式的表述，就黨內關係而言，黨內為體黨外為用；就政治和經濟關係而言，則是政治為體經濟為用。而對於劉少奇而言，上層建築和經濟的關係，就是前者為體後者為用；至於個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關係，亦即前者為體後者為用。鄧小平將這種體用觀還進一步應用到大陸內外關係尤其是文化關係上。就鄧小平而言，如果無視這種區隔，對屬於「體」的層次的領域，要求以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原則來操作，這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式的想法和作風；屬於「體」的層次的領域具有保證屬於「用」

<sup>8</sup> *Ibid.*, pp. 16–19.

<sup>9</sup> *Ibid.*, pp. 19–20.

的層次的領域，不致於違背集體利益或挑戰損害中共的權威。

劉少奇和鄧小平這種內外有別的觀念，與毛澤東基於民粹主義所形成的看法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毛澤東而言，人民群衆是創造歷史的唯一力量，所謂真理不過是人民群衆創造歷史的一種理論總結而已，黨既無權宣稱擁有引導人民群衆的革命運動的真理，也不能宣稱通過體現人民群衆的利益而擁有真理和德性。在群衆運動之外，別無真理可言；<sup>10</sup>中國大陸在中共建政後要邁向共產主義就必須不斷革命，而民粹主義是中國大陸政治和經濟等一切系統運作無法避免的方式，因此政治和經濟沒有什麼區別，而更進一步講，根本無所謂黨內黨外的區隔。毛澤東雖然並沒有列寧精英主義的先鋒隊政黨的道路，民粹主義的立場使毛澤東背離了以精英主義為基礎的制度化的黨的建設路線。如果走精英主義和制度主義的道路，就會走上官僚主義，使中共脫離人民群衆，甚至使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重新復辟，那麼中國大陸就永無邁向共產主義的可能性。

一般都認為，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革所走的路線是對中共建政初期所走的蘇聯模式注入了色彩鮮明的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因素；當然，毛澤東並不是全然繼承蘇聯模式，蘇聯模式對於毛澤東而言是官僚主義復辟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因為蘇聯模式遵循的是精英主義和制度主義的原則，若繼續走下去會使中共脫離人民群衆，走向反革命的方向。

毛澤東的平均主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sup>11</sup>

(一)毛反對以物質激勵方式提高生產力產量，反對將工作和所得成正比例的掛鉤；雖並未完全取消工資差距，但在文革時候凍結工資差距的變動，甚至取消紅利制度。

(二)毛要求各省各地區能成為大而全或小而全的能自給自足的工業生產和消費體系。

(三)工業企業部門必須成為自給自足的全功能單位，兼具有經濟、社會福利、教育尤其是政治的功能。

(四)每個人必須成為兼具工農商學兵多種角色的多功能的人。毛澤東的平均主義使其形成細胞式的政治經濟思想，即全中國大陸個人以及條條塊塊，都必須成為兼具全面功能的細胞體。對毛澤東而言，這些平均主義的作法要能展現通過民粹主義式的群衆運動，不管是實踐層次或在理論層次

<sup>10</sup> *Ibid.*, pp. 17–18.

<sup>11</sup> 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p.18.

，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都具有邏輯關聯性。毛澤東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心態的邏輯發展，就走上反智、反知識份子以及相對的貶抑科技在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的方向上去。此外，毛澤東的民粹主義使其強調以群衆運動來取代黨，既反對黨機器所表現的制度主義和精英主義，又替其個人崇拜作出從理論到實踐的合理化辯護基礎。

鄧小平在後毛時代所強調的除文革弊端，其實主要就在於揚棄毛澤東的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路線，以使中共和中國大陸重新走回制度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方向上來；不過，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形勢卻將鄧小平擠壓成超出制度之上的最高權威人格；而且，在強調集體領導的同時，鄧仍然高度強調所謂的領導核心的重要性，集體領導制度成為鞏固具有高度人格化的領導核心的手段，因此，後毛時代鄧小平所走的其實只是制度化的人治主義路線而已。

鄧小平在後毛時代，基於除文革弊端的前提，基本上是從政治考量去思考摸索改革方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觸動中共既有體制以及不能損及中共的領導權威。於是鄧小平選擇了在計劃體制之外另創一塊市場，亦即在國有國營企業之外，允許私營經濟、特區、合資合作經濟的存在，使國有國營企業以及計劃體制系統不會成為改革的反對者；因此，鄧小平在還相當長時間內允許價格雙軌制和經濟體制雙軌制的存在，推遲了價格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此外，鄧小平更積極拉攏地方力量給中央保守力量施壓，這其中最重要的是鄧小平支持財政和經營權下放給地方以爭取地方支持改革。<sup>12</sup>

有不少人看到鄧小平允許市場和私營經濟等的存在，就直接的認為鄧小平走資本主義道路或偏向資本主義道路，這種看法是相當浮面的。

#### 肆、後社會主義的思考

其實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從起源上就是後社會主義的；<sup>13</sup>因為，中國大陸從一開始就必須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方式之間作選擇，而這種選擇並不是二選一的選擇，而是企圖在傳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

<sup>12</sup> 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14~17.

<sup>13</sup> 李君如、張曾偉編，《海外學者論「中國道路」與毛澤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頁311~320）。

走出一條路來的選擇。中國大陸的選擇當然必須考慮從民族化和地方化亦即毛澤東和鄧小平所謂的國情出發，從這個向度出發，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民族化，而鄧小平強調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同樣都是後社會主義的；而就在這個向度上鄧小平才會將毛澤東的思想作為歸結為實事求是，而且也才能為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態度找到合理化的歷史現實基礎。德里克認為，後社會主義一定是後資本主義的，不管是毛澤東或鄧小平如果要迴避傳統社會主義的侷限而必須求助於其他方法時，必然會受到對歷史上資本主義缺陷的這種認識的制約；不過，鄧小平的後社會主義道路，是要將毛澤東烏托邦式的道路重新扭轉過來，讓中國大陸重新與大躍進之前的方向銜接起來。就鄧小平看來，毛澤東雖然想要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經驗的道路，但是最後卻掉入不顧中國大陸現實的困境中；因此，他必須進行撥亂反正，讓中國大陸的後社會主義道路能夠重新因應中國大陸現實國情，而回到應有的軌道上來。

所謂後社會主義，意謂人們不再把社會主義視為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亘古而不變的真理來看待，而會從各自的國情或民族條件出發，將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與本土化、民族化的過程結合在一起；亦即不再把社會主義視為超歷史、超國界、超民族、超地域的具有普遍有效的理想目標，而是必須因應現實而不斷被修正調整的理念和建制。

後社會主義必定是後資本主義的，但這並不是從古典馬克思主義所謂社會主義是後資本主義的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和階段這種意義來講的，而是從社會主義從起源就是對應於資本主義的弊端，企圖跨越資本主義弊端來講的。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採取了諸多資本主義的手段和方法，但就中共而言，這只是為中國大陸重新創造邁向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通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營造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條件；亦即，是為邁向實現社會主義服務的，而不是要滑向資本主義。

其實，從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始，中共就走上了後社會主義的方向；而毛澤東在五〇年代中期以後對蘇聯經驗的批評，以及鄧小平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更表示中共在建政後繼續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在發展。

不過，鄧小平雖然強調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這不表示中共可以任意選擇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式或途徑，而必須通過保持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合理關係作為條件。在文革期間，中共企圖完全斷絕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關係快步邁向共產主義，再加上毛澤東的民粹主義（populism

) 作風，使得中國大陸為之付出慘痛的代價。而今中國大陸走改革開放道路，企圖讓中國大陸保持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關係，這應該是過去經驗制約下的結果。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大陸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以資本主義為條件。因為，當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結合時，資本主義再也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

中共將改革開放定位成銜接新民主主義階段，其目的是在將大躍進和文革走錯的方向，重新擺回正常的軌道上來，消弭社會主義作為高級社會形式和中國大陸落後的經濟條件的差距，透過提高社會生產力，塑造中國大陸重新邁向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重新使社會主義作為一個理想目標成為可能。若依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邏輯發展來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已形成互為條件，互為過程，互相證成的辯證有機結合關係，社會主義很難再被視為是優於或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或理念；而且，當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種關係時，我們也不能以簡單的融合論的角度來理解，因為，通過辯證的有機關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仍然各自會具有自己的邏輯發展機制。

其實，從中共建黨開始，其訴求總是環繞著如何對待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力量這個問題轉，從反帝、反封建，一直到人民民主專政，以致於到大躍進、文革，以及改革開放，都脫離不了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如何相處這個問題。抽離這個主軸，對於中共黨史的理解，就會顯得非常抽象和籠統，甚至不著邊際。中共現在要讓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結合，但同時又害怕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宰制，於是，在運用資本主義手段時，又不得不防止資本主義的可能負效應和傷害，而這種防止工程就最主要體現為現階段中共對社會主義定義的功能；亦即，在現階段，社會主義主要體現為防止資本主義流弊，或管制資本主義負效應的國家強制政策，以便於維持中國大陸相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而這相對的就是，由社會主義作為維護中國大陸透過資本主義手段提高生產力的角色；社會主義體現為既要維護資本主義以及防止資本主義的雙重角色，這是由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現實所決定的，而這雙重角色的張力，也會進一步混淆人們對社會主義與中國大陸關係的看法。

中國大陸在鄧小平死後，就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激烈，如果不顧文革教訓，企圖重新讓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刀兩斷的話，其後果恐怕不是中共任何高層領導人所能擔負得了的；而且，從以上的論述可知，中共所走的後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方向，是不依任何人主觀意志而改變的，

蘇聯經驗或古典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或共黨主義理念，都再不能直接成為中國大陸現實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內在條件，而通過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合理結合關係，作為政治與經濟運作的基礎，恐怕是中國大陸別無選擇的途徑，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結合並不是簡單的向資本主義靠攏或倒退；依照前面的論述可知，其實中國大陸今後既必然要走後社會主義方向，也必然是要走後資本主義方向的。這些方向趨勢，是不依任何意識型態設計或作為而轉移的。

（校對：王坤煌、江今葉）

\*

\*

\*